



AJSS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

AJSS, Vol. 1, No. 1, 2026, pp.56-65

Print ISSN: 3106-6836; Online ISSN: 3106-6844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ass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AJSS260107ciccy>



“时空压缩”视阈下当代中国青年的文化认同研究

张廖平 (Zhang Liaoping), 罗天宇 (Luo Tianyu), 朱炜泽 (Zhu Weize)

摘要: 在哈维所揭示的“时空压缩”进程中，资本逻辑不断加速空间的重构与时间的碎片化，使个体经验游移于实时性与不确定性之间。当代中国青年正深陷其中，他们在城市化与数字化交织的网络中迁徙与生存，在算法节奏中构建关系与认同，面对的是被高度压缩的生活空间与不断被打断的时间感。他们既承受全球资本“现在性”的重压，也在流动中寻找归属与意义。在这一张力下，青年文化实践成为一种追索根系、抵抗抽象同质化的过程，是对生活位置、价值坐标和未来可能性的重新协商与想象。

关键字: 大卫·哈维；时空压缩；中国青年；文化认同

作者简介: 张廖平，男，哈尔滨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业硕士研究生，硕士，哈尔滨师范大学，2051683065@qq.com。罗天宇，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通信地址同济大学袁和楼 1801，luotianyu@tongji.edu.cn。朱炜泽（通讯作者），1752855873@qq.com，男，“情暖童心·云上同行”志愿助学活动青年顾问，双峰县青年联合会委员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Title: Cultural Identit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Youth in the Perspective of “Time–Space Compression”

Abstract: Within the process of “time–space compression” as revealed by David Harvey, the logic of capital incessantly accelerates the reconstruction of space and the fragmentation of time, rendering individual experiences suspended between immediacy and uncertainty. Contemporary Chinese youth are deeply entangled in this condition: they migrate and survive within networks shaped by the interweaving of urbanization and digitalization, constructing relationships and identities under the rhythms of algorithmic regulation. They confront highly compressed living spaces and a constantly interrupted sense of temporality. While bearing the heavy pressure of

the global capital's "presentism," they simultaneously seek belonging and meaning within mobility. Under such tensions, youth cultural practices emerge as processes of tracing roots and resisting abstract homogenization, thereby renegotiating and reimagining their life positions, value coordinates, and possible futures.

Keywords: David Harvey; time-space compression; Chinese youth; cultural identity

一、大卫·哈维时空理论的数字化转向

（一）时空压缩的内涵与哈维经典阐释

大卫·哈维在《后现代的状况》中提出“时空压缩”这一惊人隐喻时，他似乎已敏锐地预见到电子脉冲在世界地表织就的荧光蛛网。哈维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提出了一套“时空压缩—灵活积累—社会文化转型”的解释路径，用以揭示资本在应对过度积累危机时所采取的再调节策略及其外溢效应。当积累遭遇利润递减、消费饱和与劳资对峙三重阻滞时，资本最方便的纾困之道便是用技术与组织革新来“折叠”时与空——缩短周转周期，拓展市场辐射将货币运动的纬度从厂房、城市延伸到全球金融回路。因为“时间和空间的客观性在各种情况下都是由社会再生产的物质实践活动所赋予的”^{[1]255}，正是在资本调节机制不断重构物质实践结构的过程中，时空压缩才成为有效的危机应对机制。这一战略被他概括为“灵活积累”（flexible accumulation），即生产流程由垂直整合向外包与网络化分散。库存因“准时制”而近乎归零，商品高度时尚化、差异化，金融则以衍生品套叠未来的不确定性。然而，哈维绝不满足于经济技术层面的描述。他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指引下进一步揭示周转时间的系统性缩减会反向塑造社会治理模式、文化心理结构与象征秩序。“空间障碍越不重要，资本对空间内部场所的多样性就越敏感，对各个场所以不同的方式吸引资本的刺激就越大。结果就是造成了在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全球资本流动的空间经济内部的分裂、不稳定、短暂而不平衡的发展。”^{[1]370} 福特主义^①时代之所以能孕育现代主义的整体美学、元叙事及其“形式追随功能”的信条，正在于其相对稳定的大批量生产体制需要在厂房、城市规划、社会福利和大众文化中形成同质化节奏，使劳动力再生产与商品消费同样呈现规模经济。但积累方式从标准化流水线转向“灵活性、分散化、小批量、快速反应”，传统的空间集聚逻辑便被拆解，伴随而来的是职业路径的不确定、劳动力技能的去规范化和市场需求的瞬时迭代；在文化层面便体现为后现代主义对差异、拼贴、怀旧和短暂快感的赞赏。换言之，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并非简单的审美趣味更替，它是资本调节机制转换于社会意识形态层面的镜像投射。

哈维抓住了这一根本点，既保留了马克思主义对阶级与剥削的分析利刃，又敏锐捕捉到文化表征与经济基础互构的动态过程，从而突破了经济还原论与文化自主论的二元对立。文化表征与经济调节已然脱离了派生与先行的关系，他们互为触媒而进行同构运动。正如哈维所指出，“资本主义制

^① 福特主义（Fordism）作为 20 世纪初由美国实业家亨利·福特在汽车制造业中首创并推广的生产组织模式，最初体现为一种以流水线技术和劳动分工为核心的工业制度，但其意义远不止于此。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演进，福特主义逐步转化为一种涵盖生产方式、消费逻辑与社会治理结构的制度性安排，其核心特征包括以规模化生产推动标准化消费、以高度程序化的流水线作业提升效率，并通过相对稳定的劳资妥协机制维系社会经济的再生产。

度之下的困难就是要找到一种表现了它的固有价值与意义的不变的神话”^{[1]272}，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形式即是这一制度性神话在不确定结构中的意识形态投影。为了将宏观结构变化与地方经验连接起来，哈维进一步提出“历史-地理辩证法”（historical-geographical materialism）这一分析范式。与传统史学将时间视为舞台、地理视为背景的线性叙述不同，哈维强调时间过程与空间形态的交织生成。资本主义危机的解决总以“时间延缓”（通过信用体系、债务再融资等手段将价值抵押于未来）和“空间转嫁”（通过海外投资、移转产业、重新规划城市等方式将危机外溢至他者）这两条管道并行展开，而每一次成功延缓或转嫁都会改写全球与地方的社会地理分布。换言之，“社会变迁的历史部分地表现在有关空间和时间之概念的历史之中”^{[1]274}。而理解这一历史性转变正是介入当代数字资本主义新空间症候的必要前提。哈维正是对“空间的历时性”与“时间的共时性”的双重考掘，才能将城市更新、美学风潮、劳资谈判乃至国家货币政策置于同一理论视域，从而建构出跨越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多学科交纵。

于是，在数字化涌浪尚未席卷全球之前，哈维的理论已为后续分析提供了四根支柱：其一，时空压缩为资本逃逸危机提供了技术与组织支点；其二，灵活积累以重组劳动-消费-金融三位一体的方式取代福特式稳定性；其三，文化表征与经济调节并非派生与先行的关系，而是互为触媒的同构运动；其四，历史-地理辩证法要求我们把局部症候与全球动力联结起来，既揭露异化，又寻觅超越。正是凭借这四根支柱，哈维不仅成功解释了二十世纪后半叶从底特律流水线到纽约 SoHo 画廊的空间转向，也为我们观测二十一世纪数字资本主义的新症候——算法时空、数据劳动、虚拟金融与情感消费奠定了方法论的坐标。哈维当年的观察仍以钢筋、油墨与人群的速度为参照；然而四十年后，电子媒介——尤其是移动互联网与云端算法——已将那条轨道推至光速，迫使任何重新讨论其理论的人都要在数字的镜子里重读“时空压缩”。空间不再是约束而成了可供套利的变量，时间则由历史的连续序列退化为可以被无限切片的“实时”。对照这一坐标云端算力和平台逻辑如何进一步压缩周转时间、抽象价值尺度、重塑空间差异，并在当代中国社会语境中构筑起青年文化认同的新型张力场。而这一理论铺陈之所以优先展开，正因为任何对中国青年处境的阐释，若脱离了哈维揭示的资本动力链条与时空结构，就无法真正触及问题的根部。

（二）数字媒介、实时网络与新型社交空间中的时空压缩演化

哈维所描述的“时空压缩”最初源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金融去物质化和灵活积累相互作用下资本循环的加速。在今天数字化巨头所构建的庞大算力网络中，这一机制已被推向极限。在新的环境里数据被算法切割、重组和分发，时间的度量单位几乎缩小到毫秒，空间则在平台、云端和终端的跳跃之间迅速折叠成可视化的界面。在数字技术的架构下，哈维原本提出的“周转时间—价值实现—地理重组”三联逻辑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奏。数据流的零摩擦特性让传统生产链的物理惯性被瓦解，周转时间接近理论上的“瞬时”。商品的迭代和内容的生成被极大加速，脱离了传统生产模式中的工艺与物流限制。与此同时，价值的体现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金钱、时间和空间的相互控制形成了我们无法忽视的社会力量的一种实质性的连结系列”^{[1]282}，而在今天它已转化为新的指标，如流量、点击量、沉浸时长等，这些通过算法实时折算为经济价值表现。数字媒介正是控制关系的技术凝结，它使资本得以摆脱地理摩擦，实现对价值逻辑的重编码。通过广告竞价、精准推送、数字资产化等金融化手段，资本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快速重绘“可见度”和“不可见度”的分布。“生产中创造的大部分价值和剩余价值都通过虚拟的管道，以各种复杂的方法被抽走。”^{[2]42}这使得价值的交换仅仅依靠注意力的捕捉和数据的流动就能进行再分配，完成了对信息流和行为的掌控。速度、抽象和重组的加速，改变了地理空间的管理和控制方式。在传统经济中，空间差异主要体现在产业区位和地租等方面，而如今，空间控制的核心转移到了算法与数据的微观管理上。在同一座城市，

两个个体可能会因不同的算法推送而被导向截然不同的空间景观和消费路径；在同一个虚拟社区，用户根据个人画像被划分进看不见的“舱室”，享受不同的信息和资源。“人们被逼迫着要不断追赶他们在社会世界与科技世界当中所感受到的变迁速度，以免失去任何有潜在联系价值的可能性。”^{[3]46}数字栅栏加剧了哈维所描述的“地理分散化”和“空间同质化”的矛盾，传统的社会空间结构被算法化、个性化的管理所取代，极大地压缩了个体的社会交往和文化归属感。

哈维早期曾提到，资本的流动在金融和信息流通的层面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地理想象力。而虚拟资本的扩展，在今天表现得尤为显著。从区块链代币经济到元宇宙地产，从社交平台的打赏和分成机制，到广告投放的精确算法，资本的运作模式已经彻底摆脱了传统生产环节的束缚。信息流、流量和情感连接成为新的资本形式，而不仅仅是廉价劳动力和土地的再生产。随着资本对空间和行为的更精细化控制，个体在社会中的位置和身份也开始被“微分几何”式地划分。社交媒体和内容平台通过定位信息、消费轨迹和社交图谱等实时数据，精确推送个性化内容和广告。这个过程中，哈维所描述的“镜像银行”迎来了质变。“‘存在’，充满着无法追忆的空间记忆，超越了‘形成’。”^{[1]274}在电子复制阶段，影像依然能够保持某种“此在”的残响，而在深度合成和实时渲染的阶段，内容不再依赖任何原型就可以自我生成。复制体不再是“像”，它直接宣称自己就是“真”。虚拟生产的无限复制和定制生成，加速了资本对欲望和消费的掌控。短暂性变成了一种被预设的可变性，资本不再依赖形象作为周转工具，而是将其转化为引导需求和先行创造需求的智能阀门。“时空压缩始终需要抽取出我们的能力去抓住在我们周围展现出来的各种现实。”^{[1]384}在新的资本形态下，空间控制和价值生产也从宏观层面转向了微观操作。算法不仅在全球尺度上重新绘制了“可见度”的分布，同时也在局部空间中进行着精准的差异化管理。算法的精准控制，避免了传统地区性工人联合的可能性，却加剧了空间和社会结构的同质化。“非线性时间将个体对于时间的记忆切割成一个个瞬间，‘当下’的意义被不断放大，‘过去’与‘未来’的时态被解构，宏大的时间概念逐渐被分解，致使集体记忆呈现出‘点状拼贴’的特征，个体的时间焦虑会在个人的定位迷失中愈加放大。”^[4]城市天际线、在线界面、消费模式的快速趋同，地方性的文化景观和社会形态很容易被抹平，然后被另一套数据化的参数重新塑形。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核心理论并未在数字时代消失，它们通过更隐秘的方式持续运作。周转时间的最小化、价值尺度的抽象化以及空间差异的算法化管理，共同构成了比传统灵活积累模式更难抵抗的资本形态。“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的困难就是要找到一种表现了它的固有价值与意义的不变的神话”^{[1]272}，而数字资本正以更具隐蔽性和扩展性的方式完成这一意识形态任务。它在用户“默认接受”的算法环境中，将社会关系与消费逻辑悄然嵌套。对中国青年文化认同的影响尤为显著。在时空压缩的环境中，个体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归属感面临碎片化、实时化的挑战但与此同时，这也为打破旧有的社会结构、重建新的情感联系和社群纽带提供了潜力。

二、当代中国青年文化认同的困境与理论映照

（一）网络文化与消费语境下的认同碎片化

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社会几乎在一夜之间跨越了工业化与信息化并轨的关键门槛。“西方借助理想化的手段将异域文明改造成匹配了自我救赎与自我优越的双重镜像机制，实现定型化的永恒‘他者’，并将其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具象化载体，进而强化群体身份认同和以西方为中心的强权话语体系，持续操控着他者媒介形象‘自塑’的边界与可能性。”^[12]移动互联网、高铁网络与跨境电商的迅猛扩张，使“距离”迅即折叠为一点点击、“时差”被压缩进秒表式跳动的弹窗与推送。在这前所未有的时空压缩张力场中，当代中国青年集体登场——他们既是数字平台的“原住民”，又是哈维所说“灵活积累”（flexible accumulation）的最前线实验体。与七十年代末美国制造

业危机背景下崛起的“嬉皮士”不同，今日中国青年所面对的是一条先天就被平台资本塑形的职业与生活通道。算法驱动的短视频工厂、零散外包的内容众包、以直播带货为核心的消费-生产混合模式。所有这些劳动-消费双重身份的动线都在不断收缩的周转时间里被迫加速，从而将“稳定职业—城市定居—阶层上升”这一工业社会的线性叙事拆解为“项目—流量—绩效”的碎片化循环。构成了一条从职业到生活都被平台资本塑形的通道，其周转节奏不再由装配线或交通网络决定，反而被云端算力与用户活跃度实时校准。空间差异亦随之转换。传统工业地理中的地租与区位优势，如今凝结为平台流量倾斜与地域性标签的商业化配置。哈维在《后现代的状况》中对“灵活积累—时间—空间压缩”的论述，在中国平台经济场域获得了算法化升级的生动注脚。“数字技术的发展与数据的商品化走向致使用户的在线活动为平台免费提供了“活劳动”，资本家利用数字技术模糊生产与消费、工作与生活之间的界限，使用户于无形中“自愿”地创造剩余价值。”^[5]资本对速度和流动的崇拜带来的首要文化后果，即是认同范畴的“即兴化”与“流体化”。在福特主义城市里，工种、社区与大众传媒曾经共同滋养相对持久的文化归属；而当代青年则被迫在抖音的15秒与微博热搜之间高速切换。今天的“特种兵游客”明日或许就成为“Citywalk”“社恐治愈”标签下的新对象。哈维指出，后现代资本需要通过短期欲望循环来维系超额利润，因此“身份”本身被商品化为可定价的兴趣圈层、可变现的社群符号。青年文化认同因此在“隐性强制”中被引导、消费与替换——他们乐在其中却难以察觉异化，构成一种主体虚无与自我对立交织的情感困局。在这一逻辑下，青年认同是可更新的显性图示，经验累积的深层结构不复存在：头像框、弹幕梗、IP联名限量款在同一时间轴上共存又迅速遗忘，验证了文化表征与资本调节在瞬时同构中完成突变。更深层的矛盾体现在时间经验的撕裂，一方面，宏观经济的加速度制造了令人眩晕的“风口”想象，青年被承诺“只要入场及时便可积累第一桶金”；另一方面，房地产高杠杆与学历通胀又不断推迟其社会再生产链条中“落地”的节点。当“加速”与“延迟”并置于同一生命历程，主体难以借由线性叙事完成自我整合，只得依赖碎片化消费与平台指标获取实时意义补偿。哈维所描绘的“短暂性”与“精神分裂式时间感”遂在中国青年身上获得具身化表达：高铁清晨出发、深夜归城的周末特种兵旅程仿佛资本周转的模拟，而刷屏热点的极速遗忘则形成对历史深度体验的系统抽空。

与此同时，帝国主义意义上的地理外溢在国内尺度被复制，跨地域身份想象与真实资源分配之间的裂痕不断扩大，进一步挑战“国家共同体”与“代际正义”的叙事信任。面对这一结构性张力，中国青年呈现出哈维所称“批判—潜能”并置的双面性：一端，犬儒与逃避成为抵御时空压缩焦虑的情绪避难所——“躺平”“摆烂”与自嘲式段子，在流量语境中迅速传播，成为一种去政治化的日常反应机制，既是对生活压力的自我调侃，也是对制度期待的集体冷却。青年不再寻求改造世界的宏大叙事，而更倾向于维持个体可控的生存状态，以此回避被动卷入失衡结构中的无力感。“青年人认为今天的生活是要为未来牺牲和透支的，他们将自己的社会主体性悬置起来了，呈现出不停地想抓住什么东西但是又抓不住的焦虑以及希望物质生活尽快得到改变的迫切心理。”^[6]这种“延迟满足的幻灭”逐渐侵蚀青年对现实变革的信心，使得未来被视为无法抵达的抽象负担。另一端，亚文化、公益行动与灵活组织为主流消费逻辑开凿局部裂口。“996ICU”开源项目对算法压榨的反讽、“反向旅游”对中心—边缘空间秩序的戏谑颠覆、独立乐队小巡演在十八线城市的地下扩张，皆可视新的社会想象萌芽。它们诉诸网络协作与微型地理空间，用实时链接对抗时空压缩带来的情感疏离，也在局部重建共同体的耐心与深度。尽管这些碎片化行动尚不足以替代体制层面的再分配机制，却印证了哈维关于“地方与差异”潜在进步性的判断。灵活积累虽打开了集中化产业组织的裂缝，但也为底层声音跨越传统工会或政党管道创造了新的连结路径，使抵抗节点得以在全球资本网络内部孕育。网络文化与消费语境下的认同碎片化也不是单纯的世代症候，成为了哈维式时空压缩与灵活

积累在中国数字资本主义图景中的具体显影。只有透过对这些碎片化现象背后时空结构的批判性追问，我们方能探知青年主体在加速与延迟、全球与地方、消费与生产的交织张力中，何以可能重新奠定自我与共同体的深层纽带。

（二）全球化背景中的“地方—全球”张力与青年价值取向

哈维的“时空压缩”概念最初揭示了加速的当下如何侵蚀个体对历史连贯性的认知。在这一过程中，青年文化认同如何在灵活积累所制造的空间裂解中发生重新编排，成为了一个核心问题。沿着哈维对“空间修复”与“地方再造”的辩证阐释，我们看到资本在追求超额利润与规避危机的过程中，常将其内在矛盾外移至新的地理坐标。正是将空间塑成“临时容器”的运动，使地方形象与集体身份不断被拆解、重组并投向市场。进入数字化时代，“数字技术在流通领域中的应用推动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流通组织形式的变革，并与商业资本相结合创造出以平台为中心从事商品流通活动的新型流通组织，即平台组织。”^[7]这一过程通过算法逻辑得到了加速。从短视频平台的“同城热榜”到电商系统的“地区专享价”，空间不再是静态的场所，它被切割成流量单元、根据观看时长与购买转化率重新排序的可交易资产。在市场化的空间再造中，地方文化的符号被重新编码，成为资本寻求利润的工具。我们不难发现，在高铁与5G信号普及的乡镇中，“村BA”与“村超”迅速成为全国性的狂欢热点；在都市白领的午休时段，“City Walk”和“本地宝藏市集”则将旧城街巷转化为消费舞台。这些现象似乎呼应了哈维关于“地方差异复活”的论述，当资本主动发掘并塑造多样化的消费场景，本土文化的符号材料得以被重新利用，地方文化复兴成为一种资本驱动的市场现象。然而，若深入追问，这一复兴实际上是灵活积累的一种投机策略。正如哈维在《后现代的状况》中所指出的，每一次空间修复都以更快的价值回收为前提，地方文化成为了可以迅速折现的资产，而青年则被引导以“消费即参与”来完成对家国情怀的瞬时致敬，却无法分享衍生的利益和决策权。平台社会的“数字劳动”不仅超越了工人阶层界限，还将普通用户在休闲时间所生成的行为数据纳入劳动范畴，其产品反过来在广告、推荐系统中控制并规训用户自身。用户并未作为生产者获得主体性，反而沦为被算法驱动的“行为资本”，其日常互动、审美偏好与情感反馈均被转化为平台优化的原材料。“这些本来用做传情达意、建构青年文化的符号与工具，却反过来成了规训、同化甚至反噬青年个体语言方式、审美标准乃至思维能力的异己力量”^[8]。青年文化渐沦为平台逻辑下的可预测消费风格与被动情绪反应，其“文化能动性”在无声中被消解。悖论揭示了哈维关于“地方主义两重性”的深刻洞察，地方感的重建为青年提供了重新讨论共同体和记忆的窗口，地方文化的重塑却在资本的镜像中转化为固化的边界和身份幻象。当前数字资本主义已形成一种“平台式生产关系极化”：头部平台聚合技术与资本形成“数字寡头”，青年则成为“数字佃农”，劳动权利被进一步削弱，身份分层被隐蔽固化。

更值得警惕的是，“以广播、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大众媒介带给民族主义一个特殊的结构性改变就是让“媒介事件”成为可能。”^[9]进入数字媒介时代后，这一媒介事件的结构逻辑被进一步加速并碎片化，算法不仅塑造信息的传播路径，更在无意识层面参与民族主义情绪的组织与引导。算法推送放大的地方符号往往与“网络民族主义”并行生长。在近年来，诸如“国潮即正义”和“买国货即爱国”的营销叙事通过社交媒体迅速裂变，将爱国情感与消费品牌逻辑交织在一起。消费者不仅被动接受营销信息，更在情感上与消费行为紧密绑定。然而，基于消费动员构建的“快闪共同体”存在隐蔽的风险。当市场竞争或供应链摩擦触及情绪阈值时，这种以“经济爱国”为核心的情感动员可能迅速转化为排他性的舆论围攻。哈维早在“灵活积累”阶段就指出，地理政治想象在民族国家框架内重新确权，因为国家机器仍然是缓解全球漂移不确定性的最后保险。在中美技术脱钩与贸易制裁的背景下，中国青年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双重压力下经历著文化与情感的冲突。他们在跨国游

戏与流媒体平台上享受去疆域化的文化混剪，但又在平台情绪调度下屡屡激起“经济爱国”的实时反应。爱国购买清单的满足感与限时优惠券到期的焦虑交织，恰好复刻了后现代消费社会“实时满足—实时淘汰”的循环，使青年再次陷入以消费驱动身份显现的旧轨道。

在这一过程中，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思想再次展现出其批判锋芒。它提醒我们，文化差异与地方性只有在与社会再生产逻辑相连接、并嵌入资源分配的背景中，才能避免沦为空洞的符号或社会壁垒。青年文化认同的建构不仅应超越“买什么”与“打卡何处”这样瞬时的坐标，更应在“与谁共建何种空间”这一问题中找到真正的出路。因此，当我们审视中国青年在算法裂缝中构建的地方想象与民族情感时，最为重要的不是急于评判其进步或保守，而是持续追问：这些认同的构建是否拓展了参与决策的公共管道？是否改善了劳动与生活的时空分配？是否为跨阶层、跨地域的合作开辟了新的基础？如果答案偏向肯定，那么这些自下而上的再地理化实验或许能够为灵活积累的空间壁垒打破，开辟通向社会形成的裂缝；如果答案仍然模糊，则更为坚韧的批判与组织将成为推动青年主体走出全球资本镜像并成为时空重构实践者的必要条件。

三、基于哈维理论的中国青年文化实践展望

（一）数字与实体融合的青年文化生态

哈维在《社会正义与城市》(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中强调，空间是一种社会关系的产物，其生产过程既承载了资本流动的逻辑，也释放出被边缘群体的反向能量。当代中国青年正是这一张力场中的活跃主体，他们受到新自由主义城市规划对公共资源挤压的负面约束，却又凭借数字技术的下放性与开放性，在线上与线下空间中开辟出自主表达与协同治理的新路径。“空间的生产不只意味着在预定的空间构造的世界中进行循环的能力，它还意味着重建空间关系……把绝对行动基架中的空间变为更具发展性的社会生活的相对和相关方面。”^{[10]245} 数字化浪潮首先在虚拟场域为青年提供了低门槛的试验田。在短视频、社交媒体与兴趣社区中，青年个体能够绕开传统文化生产体系的层层审批与话语垄断，自发地建构亚文化圈层。“情绪感染是个体对他人的情绪产生感应和共鸣，通过共同的情感倾向获得集体性的情感强化，而时间焦虑作为一种具有极强情绪感染力的情感模式，更易在公共空间能够轻易地实现集体性的情感强化。”^[11]哈维所言的“空间—生产”(space-making)在此得以具象，当一个B站UP主将地方小调与流行音乐融合，或当一场在线城市议题吐槽会突破地域界限，青年便通过碎片化的网络交互重新织就了“公共空间”的布景。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在线实践并非“逃离现实”的乌托邦想象，能够迅速反馈到线下——借助平台投票、弹幕互动、众筹支持等机制，青年可以将在线议题转化为街头艺术、社区微更新乃至公共政策倡议，从而在更广域的现实空间中参与哈维所倡导的“共同生产”。

进而，数字工具的赋能作用使青年在城市文化节、社区治理等传统公共场域中也能够发挥更大能动性。以城市文化节为例，当政府与大型文创机构主导的展演多集中于刻板化的地方形象再现时，青年策展人通过微信公众号、小程序、在线投票等手段，自发组织“青年策展项目”。他们在展区中融入互动装置、实时数据可视化与移动应用，使观众不再是被动的“文化消费对象”，而成为共同创作者。“正是在街区空间里，会产生深刻的文化联系，例如民族、宗教、文化史和集体记忆，这些(既可以联系在一起也可以分开)都能从完全不同的方向上(不同与典型的工作场所)产生出社会和政治团结的可能性。”^{[2]135} 哈维对新自由主义“资本—空间”挤压的批评与对“空间正义”诉求的呼吁在实践中交汇。青年既拓宽了公共空间的开放度，也通过数字化参与为城市文化增添新的多样性维度。在城乡协同的更大格局中，“在线+线下”混合实践同样奏效。乡村振兴战略为青年返乡创新提供了政策支持，但乡土空间的基础设施与市场机制仍存在不平衡。哈维在《新自由主义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中指出,资本性空间的拓展往往导致区域发展失衡,而空间正义则要求不同区域都能参与到公共利益分配中。许多乡村青年便以直播带货为切入,将农产品生产、文化传承与消费体验合并于一体。他们在短视频中呈现耕作场景、手工工艺流程,并在评论区与粉丝互动,实时回应诉求;同时,他们在村庄开设体验式田园民宿或手作工坊,使外来游客在实体空间中更深刻地感受地方文化。“不平衡地理发展也应该被认为是一种权利而不是资本主义强加的一种必然性;减少一个地方的生活机会以加强别的地方的生活机会。”^{[10]245}由此形成的“数字+实体”混合生态,不仅提升了村落自我造血能力,也重塑了乡村与城市之间的空间关系,进而呼应哈维对“空间正义”在区域维度上均衡的根本追求。创意产业与社交资本的交织则为青年文化生态注入持久动力。在城市共享工作站与孵化基地中,艺术家、设计师、科技创业者与社会组织相互借力,围绕“社区花园改造”“数字公共艺术”与“绿色微气候项目”等议题展开跨界合作。哈维所强调的“空间—生产必须多元主体参与”在此得到落实。通过众筹平台完成项目经费,通过区块链技术保障协作成果的权益分配,通过开源社区共建数据模型,他们将公共空间的治理与文化生产视为共同体实践,使文化活动超越单一维度的消费与展示成为社会创新的重要引擎。

(二) 未来青年文化可持续新范式

哈维的“累积—危机”范式警示我们,当资本在空间中不断积累后,必将触发经济、社会与生态层面的多重危机;而“韧性城市”(resilient city)理论则强调,真正的韧性是在危机中培育新的生产关系与社会网络。“我们的任务是在一个他者的世界中成为与众不同的自己:创造一个既包含自我又包含他者的框架,谁都不占支配地位,以一个基本上平等的面貌出现。”^{[10]239}对于中国青年而言,后疫情时代的突发与波动,既凸显了城市空间对公共事件的脆弱,也为青年文化实践提供了检验与升级的契机。在线与线下的动态平衡成为韧性文化生态的基石。疫情期间,青年艺术团队迅速将线下展览搬至云端,用直播、虚拟现实与互动平台维系观众黏性;同时,他们也在封控允许的窗口期内,以分时分区的小规模体验,引导受众回归实体空间激发更深度的文化共鸣。哈维所倡导的“空间不断再生产”的理念在此展现得淋漓尽致。在线平台成为应急联结网络,实体体验则赋予文化传播以温度——当某一空间节点受限,另一节点便可承担起生产与再分配的功能,构筑起去中心化的韧性网络。“对抗运动的问题是,要和这种对他们文化共享资产的广泛占有展开对话,以新的方式和方案使用那些被确认的特殊性、唯一性、真实性、文化以及美学意义。”^{[2]11}跨界合作为文化韧性注入创新动能。哈维在社区再生的论述中反复强调,危机中的再生不仅是物质投入,更是社会关系的重构。中国青年正通过“文化+科技”“文化+生态”“文化+公共治理”等多元路径,联结不同领域的资源与话语权。在共享工坊中,环保志愿者与设计师共研社区微气候监测项目;在数字艺术驻地,程序员与传统匠人联手开发互动装置;在乡村公共空间改造中,青年组织与地方政府协同制定维护机制。一系列实践表明,当多元主体在同一“生产—治理”场域中合作时,社区的适应与创新能力得以显著提升,风险也因分散而得到有效化解。再物化与集体记忆的重构,则是文化可持续性的核心维度。

哈维指出,“保持差异的权利对抗着权利的普遍性。在某种程度上这可以被视为一个幸运的而不是悲剧的情形,因为新的人类状态恰恰就是从这样不能解决的紧张中建立的。”^{[10]88}新自由主义的空间生产往往伴随“去物化”,即对地方性材料与工艺的漠视。当代青年文化行动者则试图通过重塑实物形态与符号意义,挽回被掩埋的历史与记忆。他们在废弃厂房中重建手作工坊,邀请匠人传艺并与当代设计相融;在城市地下空间将旧水厂、废弃地铁站转化为公共艺术驻地,保留原有建筑肌理,将历史语汇注入现代创作;在社区公共家具与街头景观中植入本地故事与文脉,赋予空间以情感厚度。正是在此过程中,青年不仅恢复了被资本逻辑侵蚀的“物质记忆”,也在社会层面实践了哈维

“空间正义”的诉求,使每一块土地都因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而焕发生命。而可持续文化生态的建立离不开制度与政策的支持。哈维强调,空间正义既需“自下而上”的草根运动,也需“自上而下”的制度保障。在中国,“数字乡村”“公共文化设施下沉”“青年创新基地”等政策导向为青年文化实践提供了先决条件,但真正的可持续发展还需青年与政府、社会组织保持长期而稳定的对话机制,使文化实践的需求能够被及时反映。同时,通过定期的成果展示与反馈,政策制定者亦能根据基层经验不断优化资源配置与治理模式。如此,制度化的参与管道与草根性创意行动形成良性互动,既提升了文化治理的效率,也为哈维所倡导的“共治共享”空间理想提供了可操作的模板。

结语

基于哈维“累积—危机”与“空间正义”理论构建的中国青年文化新范式,是一条在危机中锤炼韧性、在协同中实现可持续的实践路径。它以数字化技术为工具,以多主体跨界合作为动力,以再物化与记忆重构为文化内核,以制度协同为保障,在不断循环的危机与再生中,释放出持久的创新与活力。唯有如此,当代中国青年才能在数字与实体融合的混合空间中,不断拓展话语权,实现主体能动性与社会价值的双赢,并为未来城市与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源源不绝的创造力。若能持续耕耘,必将在加速变迁的资本镜厅中开辟新裂缝,将哈维“生成-世界”的理论愿景转化为可感知的社会现实。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References

- [1] 大卫·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M].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2] 大卫·哈维.叛逆的城市:从城市权利到城市革命[M].叶齐茂,悦晓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 [3] 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M].郑作戡,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 [4] [1]张月娟,姚建军.症候·溯源·破局:数字资本主义视域下青年的时间焦虑[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25,37(04):59-64.DOI:10.16396/j.cnki.sxgskxb.2025.04.010.
- [5] 胡芳,刘婷婷.数字资本主义生产全过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52(02):13-21.
- [6] [1]廉思.时间的暴政——移动互联时代青年劳动审视[J].中国青年研究,2021,(07):29-37+14.DOI:10.19633/j.cnki.11-2579/d.2021.0096.
- [7] 曲佳宝,刘凤义.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积累机制和积累趋势的新变化[J].当代经济研究,2025,(05):5-13.
- [8] 胡冰.分裂、反噬与迷失:“玩乐劳动”视角下青年社交媒介使用异化[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02):126-135.
- [9] 邹军.媒介变迁视野中的网络民族主义:兴起、演进及反思[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3):131-139.
- [10] 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M].胡大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7.

- [11] 胡沈明,汪静雯.青年群体时间焦虑的话语表征与反思[J].中国传媒科技,2024,(12):19-24.DOI:10.19483/j.cnki.11-4653/n.2024.12.003.
- [12]路丽影 (Lu Liying), 吴家滨 (Wu Jiabin).国家媒介形象“他塑”与“自塑”的动态博弈——评《美国电影里的中国形象及其影响研究》[J].现代传媒研究, 2025,1(1):137-143.DOI:<https://doi.org/10.64058/MMS.25.1.14>